



CCES

CCES 当代中国经济研究系列

张军\著

当代中国经济研究10篇

Ten Papers on
Chinese Economy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CCES 当代中国经济研究系列

张 军\著

当代中国经济研究10篇

Ten Papers on
Chinese Economy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经济研究 10 篇/张军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5
(CCES 当代中国经济研究系列)

ISBN 978 - 7 - 301 - 15152 - 5

I. 当… II. 张… III. 经济 - 研究 - 中国 - 文集 IV. F1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2180 号

书 名:当代中国经济研究 10 篇

著作责任者:张 军 著

责任编辑:李寒森 朱启兵

标准书号:ISBN 978 - 7 - 301 - 15152 - 5/F · 2177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926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em@pup.pku.edu.cn

印 刷 者: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22.25 印张 368 千字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4000 册

定 价:4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 - 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前 言

改革开放的 30 年,也是中国的经济学研究飞速发展的 30 年。从“姓资姓社”和剥削问题,到国有企业要不要改、怎么改,再到现今全球化背景下对中国改革的回顾与讨论,短短 30 年,无论是主题还是方法,国内的经济学研究都发生了“激进式”的变革。如果不太关注国内经济学研究的进展,你或许以为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还沉醉于“有没有中国的经济学”之讨论,而事实却是,这样的讨论即使存在过,也从来就不是主流。一直以来,我们对中国本土问题或现实问题的强调,也是在现代经济学语境——这个在我看来早已是默认的前提之下展开的。通过在中国这个不同于西方的制度框架内考察现有的经济学发现,也许我们能够为经济学理论提供更为一般化的答案,所需要的,是一点幸运再加上足够的洞见。

或许恰恰是因为变化实在太快,我们似乎从来没有想过,与 30 年前相比,现在的经济学研究还有什么不曾改变的。其实,哪怕“姓资姓社”也好,国企改革也罢,在当时的背景下,都是事关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大事。30 年过去了,不变的正是经济学界对现实问题的关怀,是学者的一种社会责任感。诚然,类似于“姓资姓社”这样的问题,按当时的讨论法是难以产生在今天看来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的,但这正是社会科学之于自然科学研究的不同。经济学亦不例外。只要经济学研究需要为政府的决策服务,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政府决策水平与经济学研究水平就是相互影响的。当然,我们始终需要强调,学者的研究应当超前于决策的水平,在今天的中国尤为如此。如果哪一天,政府需要更多地为决策的后果负责,那么决策的科学性才会更广泛地受到重视。因为到那时候,经济学研究提供的证据将成为政府问责时的呈堂证供,经济学实证研究的时代也会真正到来。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当代中国经济研究 10 篇》,收录了张军教授近年来在中国经济增长方面的十余篇论文。张军教授是我的导师,现

在也是我所在的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CCES)的主任,在我看来,他始终都是一位纯粹的学者。早在十多年前,张老师的《现代产权经济学》就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此后的《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 1978—1992》则浓缩了他从转型经济学与产业组织学的角度对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理论思考。然而,进入新千年之后,张老师的研究也发生了转型,他开始更多地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增长。先是从增长核算的角度考察了工业改革对企业生产率和利润率的影响,后来又对改革以来中国金融深化、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近来,张军教授又将视角转向对中国政治体制、政府治理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相关成果在学者间引起了共鸣。

本书收录的这些文献,正是新千年以来张军教授最有代表性的实证研究论文的一个缩影。从转型与增长这个大的主题出发,这些文献既从生产率变化的角度评价了转型的效果,也从金融自由化与政治治理的角度探讨了增长的动力。在本书最后的附录部分,作者则试图从理论上找寻中国改革经验的一般意义,并从实践上阐释中国发展历程的全球影响。

回顾张军教授的研究历程,虽然有过从侧重理论到兼顾实证的转变,虽然在技术上越来越多地运用新的计量方法,但不变的是对中国问题的执着与痴迷,是对学术研究的纯粹与激情、对社会现实的责任与关心。我想,这就是复旦的传统。在张老师身上,我看到了它的传承,在今天,我们实在太需要这样的精神了。如果读者能在阅读此书时感悟到这样的信息,无疑是对导师的勤奋和付出最大的褒奖与鼓励。

陈 钊*

2009 年暮春

* 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目 录

- 
1. 对 1978 年以来中国的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的评价 / 1
 2. 金融改革是否缓解了中国企业的融资约束? / 29
 3. 中国的金融深化和生产率关系的再检测:1987—2001 / 59
 4. 分权与增长:中国的故事 / 79
 5. 改革以来中国的官员任期、异地交流与经济增长:
来自省级经验的证据 / 114
 6. 中国为什么拥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
分权竞争、政府治理与基础设施的投资决定 / 148
 7. 中国地方官员为什么要改善基础设施?
一个关于官员激励机制的模型 / 193
 8. 改革以来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变化研究:
1978—2005 / 212
 9. 中国工业部门的生产率变化与要素再配置:1993—2006 / 234
 10. 中国能源消费模式的转变及其解释 / 262
 - 附录**
 11. 中国的经济发展如何影响了全球经济? / 285
 12. 中国的经济转型:30 年的经验贡献了什么? / 328
 - 后记 / 348

1

对 1978 年以来中国的经济转型 和经济增长的评价*

摘要 本章评价了中国经济转型的历程以及经济增长绩效。在详细阐述 1950 年以来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后,本章讨论中国持续扩大市场作用并将本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融合的途径。然后本章回顾了经济增长核算法的文献以突显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在解释中国产出增长中的不同作用。本章尤其注重考察增长轨迹的变化和这些变化背后的制度因素。本章的结束部分描述了中国经济转型的现状以及制度的转变下经济转型的前景展望,这些制度转变将会使因投资驱动而产生的经济增长所引起的社会成本和负外部性最小化。

一、导言

在过去的 30 年中,中国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巨大的结构变化。考虑庞大的投资增长,这些成果来自于广泛推行的经济改革,这些改革使中国经济对世界开放。中国人民的购买力大幅增加,整个国家的 GDP 以

* 本章是以 2006 年 12 月 20 日在东京召开的会议:“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BRICs)之崛起”上准备的简短发言稿为基础重新撰写的。原文为英文,收入 Arthur Sweetman and Jun Zhang (eds.), 2008, *Economic Transi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rty Years of Economic Reform and Opening Up*,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作者衷心感谢会议点评人的精辟评论,这是本章修改的基础。同时要感谢张熙同学在研究中的帮助,感谢谢露露把本章翻译成了中文。文责自负。

超过 9% 的年均速度增长。^①

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经济改革在农业部门执行短短几年后,国内外经济学家开始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式以及改革如何促进了经济发展感到好奇。总的来说,对中国的经济研究经历了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的划分也反映了经济学家兴趣的转变。在第一阶段,尤其是 1980 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经济学家注重考察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原因(认为是遵循渐进式改革的结果),所谓成功是指尽管实行经济改革,经济产出仍持续增长。换句话说,中国成功地避免了前苏联、东欧大多数转型经济体的经济崩溃。^②

在第二个阶段,也就是在最近几年,经济学家关注的重心转移到中国的经济增长轨迹以及持续经济增长中的负面影响。例如,越来越多的文献致力于探讨如下的问题:逐渐扩大的收入差距、环境恶化、土地滥用以及外部的或宏观的不平衡。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更为广泛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可能丰富增长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文献。一些经济学家进一步思考,中国的经济转型和增长经历可能加深对制度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解(Jefferson, 2008)。

本章的目的在于从机制和制度的角度评价和解释中国经济的成功表现与原因。已有的文献集中于考察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中的作用(例如,Yao, 2006)。一些学者用增长核算法来分析经济增长的来源(例如,Bosworth 和 Collins, 2007),另一些则考虑地方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独特作用(例如,张军和周黎安, 2008)。本章评述了这些研究并特别关注中国经济动态增长的制度原因。本章将提及政府治理体制的演变,因为治理体制成功地将改革前中国强大的政治集权和广泛的经济分割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

本章开始部分描述了改革前中国经济体制的形成及其特征,然后讨论了中国通过什么策略来执行经济改革计划并引导经济体制逐步转变。接下来的一部分在东亚经济背景下考察中国的经济增长。随后的部分讨论了主宰中国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的制度演变,特别考察制度转变在地

① 尽管在 20 世纪 90 年代,人们一开始怀疑官方数据的准确性,但是中国从那时起已致力于改善数据的质量。岳希明、张曙光和许庆春(2005)在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的统计工作演变过程进行了评述。有趣的是,当人们认为中国的 GDP 计算中存在高估的问题时,2005 年经济普查显示,中国庞大经济的一部分 GDP 被低估了,低估的 GDP 约占整个 GDP 的 20%。

② 在中国,林毅夫等(1994)、盛洪(1994)、张军(1997)都试图解释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的经济改革为什么取得了成功。在 20 世纪 90 年代,关于渐进和激进式改革的相对优点有一场争论。例如,见 McMillan 和 Naughton(1992)、Sachs 和 Woo(1994)。

方政府面临的政治控制和激励形成中的作用,并解释中国拥有较高的投资率和储蓄率的原因。本章的最后将会给出结论性的评价。

二、中国经济体制的形成和遗产:1949—1979

中国 20 世纪 50 年代的发展战略和发展表现是 1978 年推行经济改革的根源。中国共产党于 1949 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目的就在于使国家强大,人民富裕。国家领导人认为这一目标可以通过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实现(林毅夫等,1994)。然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而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中国,经济发展不足,资本是稀缺的。正因为这一原因,国家建立了集中计划机制以分配资源,同时工商业被国有化,农业实行集体化。中国的领导人认识到国家的未来取决于快速建立并发展新型经济。^①

在当时与世界各国政治和经济往来缺乏的情况下,中国发展重工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首先,那时超过 80% 的人口仍旧生活在农村。参照苏联模式,中国的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给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特权。首要的任务是集中所有的物资和精力奠定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先决条件。面对险恶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中国共产党相信这是带领全国人民从农业经济走向工业经济的最好途径。

但是,发展重工业不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资本的供给极度缺乏,因此,即使是存在市场经济,依靠发展重工业的增长也不会实现。发展重工业需要很长的准备时期和大量的初始投资。中国当时同发达国家的关系还没有正常化。这意味着取得必要的技术和设备将会非常困难,更不用提调动资金的困难了。从根本上讲,中国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违背了其比较优势(林毅夫等,1994)。

因此,中国不得不人为地降低重工业发展的成本,也就是通过压低劳动力、资本、原材料以及外汇价格并从国外进口设备和引进技术来降低成本。为了实现这些低成本,中国不得不放弃市场机制而代之以新的国家计划政策,这一政策将决定产品和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同时,低利息政策也保证了重工业以较低的建设成本快速发展。

如上所述,发展重工业的核心要求是资本密集设备的积累。为了保证这种必需的设备能够进口获得,中国人为地高估国内货币并干预汇率的形成。因此,中国的官方汇率固定在市场出清汇率之上。正如图 1 所示,1995 年 1 美

^① 林毅夫等(1994)详细描述了中央计划经济的形成过程以及 1978 年之前发展战略的选择。

元兑换 2.46 人民币,1973 年官方的美元汇率仅为 2.02,1981 年为 1.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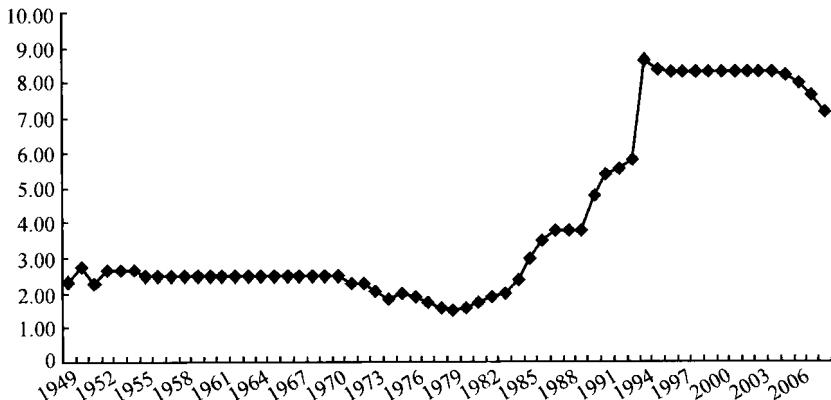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的汇率(人民币/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各年数据)。

因为经济自身无力筹集资金,政府被迫采取农业的高税收政策,同时设定低名义工资以保证获得廉价劳动力。低名义工资的后果是作为生活必需品的农产品的低价格制度。

不难看出,信贷、外汇、原材料、农产品和许多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和需求失去平衡。为了克服这些问题,中国政府在宏观层面上建立了按计划分配资源的机制,这一机制由几个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是金融部门的管理体制,它对金融部门实行垄断和集权,将有限的资金配给到需要的企业和部门。第二个部分是国际贸易和汇率管理制度,也对国际贸易实行垄断和集中。第三个部分是物资管理体制,经济建设所需要的所有资料直接由国家计划部门分配。在微观层面,中央政府建立强制性产品计划分配制度和统收统支制度,与之相伴随的是农业的集体化。

要指出的是,尽管中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建立了计划体制,但是它的执行却很困难,最终也没有成功。在形成中央计划体制不久,地方官员、领导人和经济学家之间开始了无休止的争论(吴敬琏,2003),争论的焦点是经济计划和财政预算应该在什么范围和什么程度上集中管理。这场争论和中央计划本身试错性的结果是中国多次重新定义、调整和协调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与国有企业、投资、城市土地和财政收入相关的产权。^①

① 吴敬琏(2003)对中国计划体制的形成和演变有一个系统的分析。

尽管经济学家过去一直在争论东欧和前苏联模式的集中计划制度的缺点,但上文的争论在其他计划经济体中并不常见。大多数苏联型经济执行中央计划的机构是专门的政府工业部。这些部垂直分布,对产品和要素投入生产者实行垂直控制。中央并没有赋予地方政府任何权力来执行中央的生产和投资指令。

但是中国的情况与其他计划经济国家有很大区别,甚至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初期就是如此。地方政府拥有当地的土地和生产性资产的所有权。随着地区的变动,中国的产权最终演变为一个多层次体制(Cranick, 1987)。^① 进一步而言,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1976),尤其是 1970 年,中央政府积极实行激进的从上至下的权力下放和经济分权(Wang, 1997)。因此,人们对中国的初始情况在一开始就和那些苏联模式的经济大不相同并不惊奇。中国的地方政府,从省级到镇级,都是城市土地和大多数国有企业产权以及财政收入的实际拥有者。所以中国的计划管理体制从来就没有完全集中过。

表 1 和表 2 提供了 1978 年以前中国计划体制的数据信息。表 1 显示中央拥有的工业企业数量从 1953 年到 1978 年是减少的,中国大多数的国有企业实际上是归地方政府所有。从表 2 中可以看到,在 1978 年以前,中央计划委员会的控制范围很有限,地方政府在经济计划和控制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些数据说明了中国经济体制从 1978 年经济开放以来开始演变的历史轨迹。

表 1 由中国中央政府所有的企业数目(工业部门)

年份	企业数目	占工业产值的比重(%)	占有企业的比重(%)	占有国有企业的比重(%)
1953	2 800	—	—	—
1957	9 300	39.7	5.4	18.0
1958	1 200	13.8	—	—
1965	10 533	42.2	6.7	22.0
1970	500	7.1	0.26	0.87
1978	1 260	—	0.36	1.5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 1987)。

① 在中国,从上至下的改革的结果是,地方政府的行政和组织结构与中央的几乎一模一样。这使中央政府更容易对计划体制实行分权,并监督地方行为。

表 2 改革前计划配置的范围

年份	被配置的物资和项目数		
	国家计划委员会	工业部	总数
1953	112	115	227
1957	231	301	532
1959	67	218	285
1961	87	416	503
1962	153	345	489
1963	256	260	516
1964	370	222	592
1965	370	222	592
1966	326	253	579
1972	49	168	217
1978	53	638	689

数据来源:张军(1997,第 126 页)。

三、1978 年后的经济自由化

(一) 农村生产队的消亡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安徽省最贫穷村庄之一的 18 个当地农民秘密聚首,决定将农地的使用权从村庄私分到各农户。他们的决定后来成为其他村庄模仿的对象。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这个小村庄的经验被文献记载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HPRS)。^①

当这个小村庄的非法私有化被中央知道后,邓小平并没有批评和责罚当地的领导人,而是认为这是应该支持和合法化的事情。当时支持和给予这种私有化合法的地位对共产党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但是邓小平战略性地劝说党内的同僚达成一致,认可在农村这样做的必要性。

因此,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党认识到并同意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合法性,并号召将这种体制推广到农村大多数地区。正如图 2 显示的那样,到 1984 年,报告表明 99% 的中国村庄放弃了生产队这种组织形式而采用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模式。在 1983 年 4 月,由党控制的村庄行政组织——人民公社最终由村委会代替。

^① Chai(1997)和张军(1998)详细描述了这种从下至上的农业改革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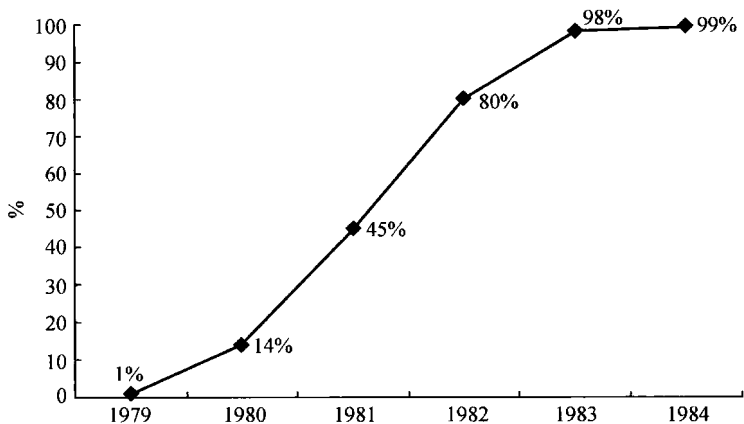


图 2 采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村庄比例 (1979—1984)

数据来源:林毅夫(1992)。

这一农业改革的结果是 1980—1985 年农业产出以年均 8.2% 的速度增长(见表 3)。世界银行研究发现,农业部门对中国 GDP 的贡献从 1978 年的 29% 上升至 1983 年的 37%。有人估计这一时期一半的农业增长来自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①

表 3 中国农业的增长

时期	农业产出的增长比例(%)
1957—1978	2.3
1980—1985	8.2
1985—1990	4.7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1991)。

(二) 工业改革

中国经济因其规模、动态绩效和与众不同的制度安排这三者的独特结合而持续受到广泛的关注。而工业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部门,其产出占总产出的一半。

中国最初的工业改革是从实验开始的,目的是提高国有企业的绩效,它产生了缓慢而不平衡的制度变化。这种变化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中国并没有采取“大爆炸”式的改革,而是选择“从计划外增长”的改革路径

① 林毅夫(1992)仔细考察了 80 年代中国的农业增长源泉。

(Naughton, 1994)。

工业部门是当时中国改革问题的核心。因此,工业改革与价格、银行、公共财政、所有权、社会福利以及研发等领域的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工业的初始情况是鼓励广大地区将权责利下放给各省和地方的。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即使在改革前,中国的地方政府也已经拥有了更多的资产和土地控制权,这些控制权对后期的改革和经济增长格外重要。

但是,计划执行中的地方主义和失误导致地方政府保护下的无计划和半市场行为。而且,中国更广大的经济环境中的一些其他因素,例如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东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和技术方面的积极参与,大大改善了工业改革的效果。

(三) 国有企业的改革

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的新环境随两个迥然不同的政策激励而演变。第一个政策激励大概在 1980 年实施,主要是在产出计划和行政配置的框架下,尝试性地提高国有企业的绩效。第二套政策于 1984 年启动,包含两个创新性做法:价格双轨制和企业承包制(张军,1997)。

第一套企业改革政策包括企业留利和金融体系最初的合理化。国有企业既要按预算为固定资本缴费,又要为流动资本向银行缴费。此外,还要求实行计划的官员逐渐将预算内投资拨款转化为可偿还利息的贷款。随后,实行对国家固定价格的广泛调整。

此外,还要求国有企业将留存利润存入三个基金中:福利、奖金和生产发展基金(张军,1998)。通过利润留存,工人的奖励增加,从而成为对工人补偿的主体。利润留存也引起工人福利基金的快速增加,这些基金被用于对住房、医疗、为工人服务的娱乐场馆融资。奖金和福利基金不仅仅旨在改善国有企业工人的利益,也旨在让他们更努力地工作。因为企业没有权力解雇工人,奖金的发放是激励工人的唯一有效机制(张军,1998)。

第二套改革政策开始于 1984 年,重点是实行价格双轨制和承包制。这些改革提高了国有部门的要素配置能力,并引入了市场机制。改革的结果是,国有企业的自主权、激励和竞争都得到改善。^①而且,这一向市场经济迈进的步伐产生的后果是,为了生存,国有企业不得不改变它们的

^① 张军(1997)详细讨论了中国工业部门的价格双轨制实践。

战略和态度。因此,国有部门的重心从完成中央的计划任务转移到了对利润的追求,这是因为在允许利润留存的情况下,企业的管理者和工人都可以从产出增加中获得个人利益。但是,利润留存并不那么容易实现。由于竞争增加,国有企业发现随着更新的、更有效率的生产者的进入,它们的产品价格不断下降。所以国有企业也不得不尽力改善生产率。最有力证明这一趋势的一个证据是 20 世纪 80 年代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表明国有企业对竞争做出了回应(见表 4)。

表 4 中国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多种估计

来源	时期	TFP 增长比率 (%)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Chen et al. (1988)	1957—1978	0.4	—
	1978—1985	4.8	—
Gordon and Li (1989)	1983—1987	4.6	—
Dollar (1990)	1978—1982	4.7	—
Jefferson, Rawski, and Zheng (1992)	1980—1984	1.0	5.3
	1984—1988	3.0	6.2
	1988—1992	2.5	5.9
世界银行 (1992)	1980—1984	1.8	3.45
	1984—1988	3.01	5.86
	1980—1988	2.4	4.63
Jefferson and Singh (1999)	1980—1988	2.5	—
Groves et al. (1994)	1980—1989	4.5	—

数据来源:张军(1997,第 231 页)。

尽管中国工业部门早期的改革前所未有地向市场经济大步迈进,但是一些领域的改革仍旧滞后。最大的两个领域就是金融和所有权,它们仍由国家掌控。将企业由国有转变为私有是走向市场经济的重要一步,因为这一举措将使企业完全对其盈利和损失负责,这将迫使企业变得具有竞争能力或者直接被淘汰出局。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地方政府所有的中小型国有企业民营化加速了。这些企业大部分都转变为非国有企业,通过引入外来投资者或由企业管理层收购来使所有权多样化(张军,2003b)。中央政府决定保留大约 100 家中央控制的国有企业的所有权,^①这些国企集中在电信、

① 目前,控制的国有企业大概有 150 家,后来因为频繁的并购有所下降。

交通和石油等战略性部门。

(四) 非国有部门的崛起

非国有部门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也经历了巨大的改革。当时非国有部门主要由农村集体所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组成,也包括一些由个体经营和私人企业组成的私人部门。在 80 年代,据估计,尽管规模小,私人部门的产出却占整个国家产出的 10%,但是中国真正的私人部门是非常小的。

自然而然地,在国有部门缺失的领域非国有部门占主导,但是即使是在这些领域,非国有部门也不可避免地与国有部门打交道。国有部门为非国有部门提供资金、设备以及加工合同。并且,由于大部分非国有部门的改革由城镇和省市实行,故而改革都地方化了。因为规模比国有企业小,非国有部门往往更有效率。一般说来,它是国有部门产品的第二生产者,但是它以更低的成本生产。

乡镇企业在非国有部门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1984 年,乡镇和其他农村企业的发展为农村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张军,1998)。乡镇企业生产建筑材料、纺织品、衣服、毛革制品和金属产品,而国有企业生产的更多是上游产品,如石化产品、电力、天然气等。乡镇企业最初集中在沿海地区,因为这些地区有丰富的工业资源(资金、熟练劳动力和农产品原材料)以及国内市场,而且能得到 FDI 和利用国外市场。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转移到东部高生产率工业部门有利于缩小东西部收入差距,这鼓励了西部地方政府也就地建立乡镇企业。相对国有企业而言,乡镇企业受更少的行政约束,处于半市场经济环境中,比国有企业在效率和产出增长上都更出色(张军,1998)。

乡镇企业、个体企业和私人企业形成非国有部门的主体。由于处于当地政府的监督下,乡镇企业比私人企业获得更多的支持。按照中国的定义,私人企业是雇佣工人超过 7 人的企业^①,而个体经营企业是个人所有、家庭经营的企业,雇佣工人少于 7 人。以就业来看,个体经营是私人部门的主体。大多数个体经营企业集中在服务部门,尤其是在更落后的地区,它是提供劳动就业的一种主要形式。在城市地区,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已成为个体经营企业的主要劳动力来源。

^① 这一定义来源于卡尔·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资本论》其中的一段。

非国有部门在工业和服务业都成为中国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在国有部门不能顾及的领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非国有部门也为农村和城市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为私有资金提供了投资机会,否则这些闲置资金将进一步增加存款需求和通货膨胀的压力。

非国有部门也为国有部门提供了良性竞争的环境。例如,在允许个体和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竞争后,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不断提高(Naughton, 1994)。同时,由于更高的工资,熟练工人从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转移。一些非国有企业因更高的生产和销售效率而将国有企业淘汰出局(张军, 2000)。

总的来说,由于市场化和工业改革,非国有部门快速扩大了中国的工业产出。正如表 5 所示,从 1989 年起非国有部门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就大于了国有工业部门,非国有部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强推动力。

表 5 由不同所有制解释的中国工业增长(1978—1992)

年份	国有企业(SOEs)(%)	集体所有制企业(%)	私营企业及其他(%)
1978	82.0	18.0	0
1979	86.7	13.3	0
1980	51.2	43.5	5.3
1981	49.5	47.3	3.2
1982	70.2	28.0	1.8
1983	63.7	34.0	2.3
1984	45.2	51.9	2.9
1985	43.7	49.6	6.7
1986	45.3	43.0	11.7
1987	49.0	39.0	12.0
1988	47.5	41.0	11.5
1989	52.5	33.5	14.0
1990	37.8	34.8	27.4
1991	43.7	36.1	20.2
1992	32.5	45.5	22.0

数据来源:张军(1997,第 230 页)。

(五) 金融部门的改革

在金融改革开始之前,中国的金融资源高度集中。金融中介机构既